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学刊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1



NLIC297087284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新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学刊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 2011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634 - 0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21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孙少华 毛晓平
责任校对 邓晓春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75
插 页 2
字 数 466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陆建德

副主编 高建平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带星号者为执行编委)

包明德 叶舒宪 白 烨* 刘扬忠

刘跃进 吕 微* 孙 歌* 安德明

严 平* 张中良 杨 义 陆建德

胡 明* 赵 园 赵京华* 高建平*

蒋 寅* 黎湘萍*

目 录

海潮大声起木铎

——再谈林纾的译述与渐进思想	陆建德(1)
台湾史志的修纂与近代士人网络	张重岗(51)
海外华文文学的若干基本观念	杨匡汉(72)
剩余价值流转中的艺术:马克思美学的经济哲学重构	刘方喜(112)
“文”与“论”:文本位“文章”新概念的一次分化	
——著述“文章”向修辞“文章”观念的演变	吴光兴(150)
论钟嵘品陶	范子烨(180)
杜诗题材风格对宋词影响研究	刘京臣(218)
蒙元新西域诗与蒙古王朝认同建构	
——以耶律楚材、丘处机为中心	王筱芸(262)
俞曲园与白香山的诗歌渊源	陈才智(297)
王熙凤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解谜	钱碧湘(309)
纪昀与乾嘉学派概说	杨子彦(343)
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目的论	户晓辉(374)
“母题”新观	张 靖(401)

Content

Translator/Writer as Reformer: A Reappraisal of Lin Shu	<i>Lu Jiande</i> (1)
The Compilation of Taiwan Local Chronicles and Taiwanese Cultural Community in the Late Qing	<i>Zhang Chonggang</i> (51)
Some Basic Ideas of Oversea Sinophone Literature	<i>Yang Kuanghan</i> (72)
Art in the Circulation of Surplus Value: An Economic— 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 of Marxian Aesthetics ...	<i>Liu Fangxi</i> (112)
“Wen” (literary works) and “Lun” (argumentative works): A Differentiation in the Concept of “Wenzhang” (essay) in “Wen” Standard	<i>Wu Guangxing</i> (150)
Interpretation of Zhong Rong’s Review of Tao Qian	<i>Fan Ziyi</i> (180)
The Influence of Du Fu Poetry on Song Lyrics	<i>Liu Jingchen</i> (218)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of Mongol Empire in “Travels to the West” Poetry of Yuan Dynasty	<i>Wang Xiaoyun</i> (262)
Poetic Kinship between Yu Yue and Bai Juyi’s Works	<i>Chen Caizhi</i> (297)
Analysis of Verdicts of Character Wang Xifeng in <i>The Dreams of Red Chamber</i>	<i>Qian Bixiang</i> (309)
Ji Yun and Qian-Jia Scholarship of Qing Dynasty ...	<i>Yang Ziyi</i> (343)
Teleology of Aristotle’s Theory of Mimesis	<i>Hu Xiaohui</i> (374)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Motif”	<i>Zhang Jing</i> (401)

海潮大声起木铎

——再谈林纾的译述与渐进思想

陆建德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揭示林纾的译述以及改良思想与甲午后变法、革命运动之间的深刻联系。林纾不仅是沟通中外的翻译家，还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对本国文化传统有着深刻反省意识的捍卫者。清末民初的知识界往往以二元对立思维为特点，而林纾强调有的价值观念超越国界，因此主张不分夷夏，新旧接续。他呼吁读书人从宦情和自我中解脱出来，不出“怨咨之声”，积极投身于实业与学问，服务国家；他提醒改革者不可有“盛满之气”，深惧“忼爽叫呶”和“傲兀凌轹”的风格不利于认识社会的复杂性，不利于只能行之以渐的改革事业。当时的激进派（不论是康党还是同盟会）国家意识淡漠，内心矫阉，或明或暗地倚仗外国势力发动内战，林纾则从域外小说认识到殖民国家善于利用别国内部矛盾，巧加拨弄，达到控制的目的。他的“西学”细腻具体，恐非个别自以为明了世界大势、心醉于几个抽象名词的新派人物能比。在晚清，林译小说及其序跋曾如“叫旦之鸡”警醒国人，但是辛亥以后，学界受制于朝代思维模式，奉民国为正朔，对不利于“共和”或同盟会、国民党的言论，难以容忍。时间一久，思维就容易僵化板滞，思想资源也偏于剧变与“简易”的一端，面对新的历史挑战，显得单一，甚至贫瘠。林纾行走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未能预见到政党政治的成败，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一个已经与清末民初全然不同的时

代的新价值。

关键词 林纾 林译小说序跋 渐进改良 戊戌政变 接续主义

一 变法·时新小说·翻译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署。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率众多在京会考的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除了要求变法、练兵,还提出拒和、迁都的主张,以示宁为玉碎的决心。尽管“公车上书”的细节漫漶不清,当事人尤其是康有为自己的回忆很不可靠,它确实拉开了晚清变法与新政的序幕。林纾是否参与此事,尚无确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对这类士气嚣张的群体事件深为戒惧。1897年11月,山东巨野教案引发胶州湾事件。翌年(戊戌)3月,中德订立《胶州湾租借条约》,入京应试的举人又纷纷上书,林纾与诤友高凤岐、清宗室寿伯蓓也相约同赴都察院,欲进筹饷、练兵、外交、内治四策,受到拦阻。他在南归前驰书一位闽籍京官,告以上书的过程以及撤下的原因:“司官不揆情理,动以宪谕见胁。某等初意亦欲执礼抗辩,第念今日士心嚣动,署状动挟数百人而来,至有要遮总宪马前,峻词相稽,而总宪转下礼优容。此等举动,某等深以为不可。盖尊宪署即以尊朝廷,稍涉激厉,便非敬上之道,故敬谨将呈领回,而又不能已于言者。”他还忠告,进言之路决不能阻塞,不然上言者“将去礼而自恣”,那将是更大的不幸^①。从这封信里,读者明显感到,林纾力主改革,心中仍存“敬上之道”,方式上也比较克制、温和。康有为呼吁变法,自为帝师、教主,激厉张扬,动辄“挟数百人而来”,近乎聚众胁迫。林纾在此所指,应是康有为在戊戌年春发起的保国会(亦称强国会)集会以及随后几次声势逼人的活动。保国会设总会、分会,已具政党规模。士人干政,引起几位御史的警觉。统筹改革的中枢已经偏于虚弱,如果进退失据,无法维持社会与政体的稳定,旨在救国的变法终将误国。

戊戌年会考期间,林纾还在同乡李宣龚(字拔可)的北京寓所见到后来

^① 《出都与某侍御书》,载《畏庐文集》,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10页。都察院主管官员左都御史又称总宪。百日维新时期,礼部主事王照“咆哮公堂”就是“去礼而自恣”的一例。林纾对上书背后求进的意图十分反感:“所谓条陈,皆爱身图进之条陈,非爱国图强之条陈也。”

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福州同乡林旭。春夏之交，三人一同乘船南归，林旭将林纾、李宣龚送到吴淞江上道别，还交林纾《榕苍杂记》一册，请作文记述他祖父林福祚（字明府）任东流县知县时平反冤狱一事。林旭是林纾的晚辈，岳丈沈瑜庆是林纾好友，叔父与林纾同出潘澹如先生之门。1895年春，林旭拜康有为为师。戊戌年保国会成立，林旭“为会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①。当年9月5日，光绪超擢林旭和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二十三天以后，林旭喋血菜市口，不久尸体移葬故里。林纾在《林明府政略》一文记述，他听闻凶耗，“太息感伤，未有以吊也”。文章写毕，一份文稿“令焚之晚翠墓”，以明作者不食言之意^②。此处的“令”字，读来有很多回味。林纾自传体小说《剑腥录》（1913）第十四、十五两章中的林晚翠就是林旭。在康梁版本的戊戌变法史里，光绪颁给康有为的第二道密诏（即所谓“衣带诏”）由林旭从宫中带出^③，林纾应该有所听闻。

林纾的翻译与著述始于丁酉、戊戌年间。中国究竟应该如何自强变法，这是他笔墨生涯里没有明言但时时浮现的主题。林纾同情而且主张维新，但是他对康有为一味勇进的行事方式，心存疑惑，对宗派小集团（“党人”）排斥异己，扩张势力，更不以为然。

《马关条约》还催生了小说界的一场革命。1895年5月，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申报》和《万国公报》上“求著时新小说”，希望借新小说抨击时文、鸦片、缠足三大时弊。他悬赏丰厚润格，并答应择优秀者印行。应征参赛的稿件多达162种^④。一两年后，中国士人中的先觉者也开始意识到“说部”的奇妙社会功能，如严复和夏曾佑写道：“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⑤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专集》之一，《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4页。

② 见《畏庐文集》，第29—31页。平反的逻辑似较勉强：“余读《榕苍杂记》，叙狱事前后失统，乃略易置之。”（第31页）林旭号晚翠，遗稿《晚翠轩诗集》由李宣龚编校在商务出版。

③ 史学界已大致确定这份密诏是康有为虚构的。黄彰健还指出，康梁出逃后丑诋慈禧，对光绪极为不利，“康、梁本不忠于光绪”。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42页。

④ 2006年，征文原稿150件在伯克利大学图书馆发现。这些稿件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11年1月出版（《清末时新小说集》，周欣平主编）。

⑤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载《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共5卷）第1卷，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梁启超则将社会风气的鱼烂归罪于通俗小说,要振厉末俗,改造社会,必以白话(“俚语”、“俗语”)小说开始^①。他意识到本土资源还不敷使用,因而提倡译印域外政治小说。

傅兰雅出题征文,侨居新加坡的富商、闽籍举人邱炜菱(号菽园居士)大表佩服。那年春天,邱炜菱赴京会试,谅必也为上书的热闹场面所激荡。戊戌变法期间,邱炜菱在自己主编的《天南新报》上撰文挾摘鸦片、缠足和时文三害^②,与三年前的征文遥相呼应。大约就在此时,他读了林纾仿白居易白话讽喻诗创作的《闽中新乐府》,书“掷地有声终破鬼,问天无路已惊人”十四字于后,“聊志同慨”^③,并出资翻刻,作千字长序,称这些作品“指陈利弊,匡谬正俗,明耻有功,尤与悟性之书为近”,望其为“星洲训蒙家善本”^④。庚子年春,他将发表于《天南新报》的文章撮集成篇,以《三害质言》为题刊布。他在卷首写道,当初见到征文广告,急欲阅读应征的时新小说,一年多以后,仍不见新书行世^⑤。《三害质言》书后附刻林纾《闽中新乐府》中与三大时弊对应的《生骷髅·伤鸦片之流毒也》、《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共三首)和《破蓝衫·叹腐也》五首白话乐府诗,“以大其传,并广吾论”^⑥。此前,邱炜菱已在《五百石洞天挥麈》写到林纾,称他在福建家乡为“坛坫之雄,一时称极”,两人已“翰墨神交”,并抄录《闽中新乐府》中“尤切乡俗”者六首,希望乡人从此“言人事,舍天象”^⑦。它们分别是《郁罗台·讥人子以斋醮事亡亲也》、《杀人不见血·刺庸医也》、《检历日·恶日者之害事也》、《棠梨花·刺人子惑风水之说不葬其亲也》、《非命·刺士大夫听术家之言也》和《跳神·病匹夫匹妇之惑于神怪也》。

二十年之后(1918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五卷五号发表《克林德碑》一文,将义和拳归罪于中国文化,罪魁祸首就是比儒家思想入人更深的道教,即缘起于阴阳家、方士的种种民间信仰,比如降神扶乩、设坛授

①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28页。

② 见邱炜菱著《三害质言》(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刊印)篇末附记,第23页。

③ 邱炜菱:《五百石洞天挥麈》,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刻本,卷九,第16页。

④ 邱炜菱:《增印〈闽中新乐府〉序》,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仲夏刻本,第3页。

⑤ 《三害质言》,第1页。

⑥ 《三害质言》中“增刻”部分的解说。

⑦ 邱炜菱:《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九,第17页。《闽中新乐府》中的《检历日》讽喻占候卜筮的迷信,有“须言人事舍天象”之句。光绪丁酉岁末刻本,第16页。以下所引《闽中新乐府》均用此本。

法、招魂捉鬼、算命卜卦、阴阳五行和风水凶吉等等^①。林纾这六首诗所抨击的恰恰就是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怪力乱神。

《闽中新乐府》是林纾第一部文学作品，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底由马江船政局工程处长、高凤岐表兄魏瀚出资印行，其创作很可能与傅兰雅的征文有某种联系。戊戌年初春，林纾丧偶，入夏不久，又是通过魏瀚的中介，任职于马江船政局、甫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王寿昌邀他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己亥年（1899）正月，林纾移家杭州，执教东城讲舍，大约就在此时，译作在福州刻竣^②，从此这部小说有多种版本行世。清末译风大盛，第一部真正流行而且感动文人学士的外国文学作品，非《巴黎茶花女遗事》莫属。

邱炜萆也把小说视为开启民智的工具，他甚至打算写一部以戊戌维新的失败为题材的小说。康有为得知消息，写诗催他早早动笔，并希望小说将如观世音说法，唤醒公众，震动世界：“以君妙笔为写生，海潮大声起木铎。”诗中还有“或托乐府或稗官”之句，说明邱刻《闽中新乐府》或邱著中所引林纾乐府诗，康有为或曾寓目^③。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大概在庚子年（1900）上半年，当时康有为正在新加坡为“勤王”募集资金。戊戌变法后期，康党图谋发动军事政变，案发后，康有为在英国军舰保护下出逃，到了海外，处处挟“衣带诏”自重。邱炜萆不知康有为作伪，将他奉为上宾，情意殷渥。那年8月，唐才常在武汉举事，得到康有为以及英日等国暗助，邱炜萆则是重要的资助人。张之洞镇压自立军后，间接对邱炜萆施加压力，使后者辞去《天南新报》总理的职位，而且公开表示与“结党营私”的康有为决裂^④。那部酝酿中的小说自然也就流产了。

也就是在那段时期，邱炜萆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他的这些文字也

①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比较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书，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页。

② 见《林纾研究资料》，薛绥之、张俊才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4页。

③ 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载《康有为全集》第十二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这首诗也反映了重新发现小说“新大陆”的兴奋：“闻君董狐说小说，以敌八股功最深。衿缨市井皆快靚，上达下达真妙音。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岑。”

④ 关于邱炜萆与康有为的关系，详见汤志钧《丘菽园与康有为》（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和茅海建《张之洞策反邱菽园》（载《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1期）。

成了经典：“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评语也可以这样理解：欧人性情本与华人相通，不同文化之间，并无本质上的隔阂。然而邱炜菱又略表歉意，他说林纾本欲译“政治思想之小说”以“开中国之民智”，草创未定，“而《茶花女遗事》反于无意中得先成书，非先生志也”^①。邱炜菱相信多译“政治思想之小说”可以开民智，通风气。他从英国政治小说版权高昂，看到英国民智之盛，还举出日本人翻译“皮根氏（旧任内阁）”《燕代鸣翁》的例子。《燕代鸣翁》应指本杰明·迪斯累利（1804—1881）最后一部小说《恩迪米昂》（*Endymion*, 1880）。迪斯累利是19世纪最有名的英国政治家之一，长期领导保守党，两度出任首相，1876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封他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皮根氏”取前两个音节）。《恩迪米昂》篇幅大，带有自传性质，涉及英国1819—1859年之间错综的政治文化。这部小说即使在华译出，也只能使读者望而却步。要打破中外畛域，还是需要茶花女这样相对简单的感人故事。再者，亚猛与马克的爱情悲剧实际上动摇了婚姻必须取决于门第、财产等观念，同样有“开民智”的功用。

晚清的小说创作，已有众声喧哗的多元格局，但是新文学的产生，毕竟有赖于大规模引进的域外小说所形成的化学反应。文学界的木铎之声，实际上发自我域外小说的翻译。在这一领域，林纾的贡献无人可及，用“海潮大声起木铎”来形容他的文学事业，不但合适，而且颇有反讽意味（主角康有为/观世音被置换），余音袅袅。这句诗带出了邱炜菱与康有为的一段历史，将变法、时新小说和翻译等话题紧紧连接，其来历使研究者时刻不忘林纾翻译与著述的特殊政治文化语境。

林纾不仅是翻译家，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小说创作取材于时事，打破传统章回小说格式，开风气之先。严家炎、陈平原、杨联芬等学者已经指出林纾小说有范式转换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本文不拟涉及。林纾为自己所译的六十余种小说作序跋（有的序跋兼而有之），共计七十余篇，长则三千余言，短则二三行，另有大量评点和识语，有的堪称完整的文章。这笔批评遗产丰富多彩，其原创性远在鲁迅

① 《挥麈拾遗》，光绪壬寅年上海铸，第1册，卷三，第5页。

的《摩罗诗力说》^①之上，又因其细腻的具体性与王国维批评理论上比较抽象的建树互相映照。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往往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两篇文章为起始点，好像它们是双峰突起的水分岭，于是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也确定在1917年，而近代文学批评则以林纾、王国维等人为收束^②。这种分期方式留下了抽刀断水的遗憾。林纾的序跋与林译小说、林纾诗文构成一个生动有机的整体，它是中国文学转型期连接新旧的关键一环。林纾善于以比较的眼光来审视本国文化，尤其是习焉不察的价值取向，往往有惊人之论；他用古文义法来理解域外小说的叙述手段，屡屡发现中西文心相近，不类而类。当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来势正猛的时候，早就从事白话文学创作的林纾反对废除古文，“强起捋须撩虎豹”^③，结果因“礼教气与反动态度”^④被打入敌对的营垒。进入80年代，林纾的地位有所恢复，林薇、张俊才等学者誉他为新文学的“不祧之祖”，他们还在林纾研究的资料收集整理方面，为后来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张俊才多年来辨析林纾与“五四”新文化派争论的缘由，使学界对林纾的所谓“顽固”心存敬意^⑤。

庚子年冬至，林纾在杭州为新创办的《译林》杂志（1901年第1期）作序。这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相继进京，拳民交哄之际，林纾友人浙江衢州府西安县知县吴德瀚与一些家人被难；夏天北京沦陷，他的好友寿伯蓓、仲蓓自杀殉国。林纾在文中形象地点明了义和团必败的道理：“今欲与人斗游，将驯习水性而后试之耶？抑摄衣入水，谓波浪之险，可以不学而试之，冀有万一之胜耶？……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

① 鲁迅留学日本时主要通过日本明治时期介绍西洋文学的著作以及勃兰兑斯的《波兰》（英文）和利特耳的《匈牙利文学史》（英文）编写《摩罗诗力说》。详见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陈秋帆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如马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和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林纾：《七十自寿诗》，《林纾诗文选》，李家骥、李茂肃、薛祥生整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70页。

④ 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载《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⑤ 详见张俊才著《林纾评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和张俊才、王勇著《顽固非尽守旧也——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者尔。”^①不习水性，却要与善泳者“斗游”，结果可想而知。林纾把译书、兴学作为“习水”的一个主要环节。熟知外面的世界，并以比较的眼光来认识自我，转移风俗，改造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容不得投机取巧。这一信念在以后数十年中也一再出现在胡适等人的著述之中。林纾与几位朋友编辑《译林》，目的是启蒙并与邪说为敌：“昔巴黎有汪勒谛^②者，于天主教汹涌之日，立说辟之，其书凡数十卷，多以小说启发民智。”以伏尔泰自励，不论是否得当，毕竟是开明思想的标记。当时清廷迁往西安，林纾不免担忧国家的未来：“今日神京不守，二圣西行，此吾曹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虽然，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燭，吾不能不燃之。”面对即将译竣的作品，他将掬一溜清溪，“洗我老眼，尽昼夜读之为快耳”^③。那一年，流窜海外的康有为和革命派都乘外人入侵之机对自己的祖国发难。林纾立足本土，有拳拳君国之心，虽然对“那拉氏”不满（或许受到康党戊戌话语的影响），仍能顾全大局。他对武汉和惠州那些被人利用的武装行动，极度厌恶。

林纾本来打算译介拿破仑、俾斯麦等英雄人物的传记，请人合作，“均谢非史才”，却译出了茶花女的故事。年近半百的林纾没有想到，他从1899年开始至1923年，竟然翻译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一百余位作家的作品共187种（其中24种未刊），另外还在1912—1913年间为北京的《平报》译外刊评论58篇^④。他的译作打开一个观察外部世界政俗民情的窗口，也为国人竖起一面自我认知的镜子，其沟通中外的巨大作用，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林纾自负于他的古文，多少沾有一点传统文人逞能争胜的毛病，但是据此暗示他不甚看重自己的翻译事业（如陈衍），则忽视了他的救时之心，是对他极大的不公。

然而这位翻译家却不懂外文。他在为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所作

①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42页。《纪西安县知县吴公德瀛全家被难事》指出同样的问题：“自义和团江于畿辅，天下汹汹，争以党杀西人为能。一二当路，复养成其毒，以祛除外患。不知吾华虚实，已为所觊。军无后继，合列强之力，以掊一国，举以乱民为责言，以理则绌，为势则龋。祸机至明，而懵懵者仍用快一时之意。”《畏庐文集》，第65页。吴德瀛被难的缘由，郭道平未刊博士论文《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北京大学，2011年）论述甚详。见第133—164页。

② “汪勒谛”当指伏尔泰。

③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42—43页。

④ 详见张俊才著《林纾评传》，附录二。

《序》(1907)中写道:“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为余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日区四小时,得文字六千言。”^①他的弟子陈希彭如此形容他“手追”的速度:“运笔如风落霓转,而每书咸有裁制。所难者,不加点窜,脱手成篇。”^②林纾落笔虽快,却是全身心投入,或喜或悲,颜色无定,“吾身直一傀儡,而著书者为我牵丝矣”(《书话》,第120页)。这种奇特的译法自然会有很多不合标准之处,他当然抱有愧疚^③。为了照顾合作者的声誉,林纾还主动承担责任^④。对林译的所谓错译和删改,邱炜萆曾为之辩护:“(林先生)讲时务经济之学,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各后起英隽所矜式。……若林先生固于西文未尝从事,惟玩索译本,默印心中,暇复昵近省中船政学堂学生及西儒之谙华文者,与之质西书疑义,而得其得力,以视泛涉西文辈,高出万万。”^⑤胡适在1922年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演变历程时,非但大大肯定了林译在古文应用方面的巨大成绩,而且称赞他对原著的理解,并说“粗能读原文”的诤难者不具备批评他的资格^⑥。这一说实际上勾销了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对林纾的攻讦。

① 《林琴南书话》,吴俊标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收集、整理林译小说的序跋,朱羲胄功劳最著。详见朱羲胄述编《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世界书局1949年版)之二《春觉斋著述记》卷三。阿英编辑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和林薇选编的《畏庐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中林译小说序跋基本上以《春觉斋著述记》为本,《畏庐小品》以《伊索寓言》跋语130则见长。《林琴南书话》使用比较方便,故用之。本文后面引用此书不再做注,页码用括弧随文注出。

② 陈希彭:《十字军英雄记·叙》,《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289页。

③ “其间疵谬百出,乃蒙海内名公不鄙秽其轻率而收之,此予之大幸也。”《孝女耐儿传·序》(《书话》,第77页)

④ 《荒唐言·跋》(1908):“至于谬误之处,咸纾粗心浮意,信笔行之,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书话》,第116页)

⑤ 《挥麈拾遗》,第1册,卷三,第5页。

⑥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7页。紧接下来胡适竟然写道:“但这种成绩终归于失败!”或许他又想起了自己在白话运动中“首举义旗之急先锋”(陈独秀语)的身份。两年后,胡适对林纾在白话诗方面的贡献也予以认可。林纾逝世后不久,他在1924年12月的《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发短文《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并从《闽中新乐府》选诗五首,以志纪念。《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60-461页。1912年至1913年,林纾在《平报》上发表大量白话诗(“讽喻新乐府”),用语不避俚俗,“屎尿”和“王八旦”也入诗。相比之下,胡适的白话诗太文绉绉了,“革命”的功劳应该打一个大折扣。据郭道平查考,林纾还在1901年的《杭州白话报》(旬报)上至少发表过五篇白话道情,用的是笔名“竹实饲凤生”。《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第278-285页。这些白话道情和讽喻新乐府一样,几乎都符合《文学改良刍议》中所说的“八事”,可惜胡适没机会读到。

硬伤当然可以举出很多,但是吹毛求疵的检查没有必要。现在的翻译理论家认为,异域文本要得到理解,必须通过本土既有的形式,甚至被打上本土特定群体所习惯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不然交流的目的无法达到。因此,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①。或者用钱锺书的话来说,翻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改写,是带有“讹”的“媒”。钱锺书称林纾的“篡改”往往有过人之处,他的“大胆放手”的发挥甚至还使很多译者羡慕不已,而他的古文弹性十足,灵活通变,一般都比原著生动简洁。钱锺书年幼时喜爱外国文学,就是林纾的“媒”做得好^②。在当时的语境下,诚如郑振铎所言,林纾称得上“忠实的译者”^③。

西方翻译史上一个现成的例子可资参考。荷马的英语译本很多,英国18世纪上半叶的诗人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用英雄双韵体(heroic couplet)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1715—1720)和《奥德赛》(与人合作,1726),译本在读书界大受欢迎,却受到希腊文专家的诟病。1791年,诗人威廉·柯珀(1731—1800)的荷马译本问世,译者试用无韵体翻译,力言自己的译文信守原文,有意取代蒲伯较为自由的译本。拜伦是蒲伯译文的热心读者,他比较了两位前辈诗人翻译荷马的文字后写了一段排炮似的文字:“不管蒲伯的译文的大错、显然的错、五花八门的错、被指责的错、被公认的错、不能辩驳的错有多少,不管柯珀有多大学问、费多少工夫、费多少时间和苦心,和他的无韵诗怎么样,谁又读过柯珀的译文?……当我第一次读蒲伯的荷马史诗时所感到的狂喜是以后读任何书所不能感到的。”^④类似的狂喜,在清末民初,甚至一直到20年代,是周氏兄弟、郭沫若和钱锺书等人共同经历过的,它所激发出来的读书与创作的热情绝难估量。这方面记载很多,不再重复,忍不住还是要举一例。郭沫若称林纾在文学上的功劳可与梁启超在文化批评上的贡献相比。他在《我的童年》中回忆,他读《迦茵小传》就爱恋上了女主人公,而《撒喀逊劫后英雄略》更给了他决定性影响,“幼时印入脑中的铭感,就好像车辙的古道一样,很不容易磨灭”^⑤。林译促

① 转引自郝岚《林译小说论稿》,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

②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载《林纾的翻译》,钱锺书等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③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载《林纾的翻译》,第15页。

④ 这是拜伦1821年给他的出版商约翰·墨雷的信中的文字,郑敏、刘若端译。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28页。

⑤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4页。

发了读者（包括《新青年》译者群体）对外文和外国文学的兴趣，催生了本土的新文学，这是毫无疑问的。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诗人、批评家马修·安诺德在他的著名长文《论荷马史诗的译本》（1860）里也比较过蒲伯和柯珀的两种译文。他承认，蒲伯的双韵体译文太齐整，有雕琢之病，但是他下面这段话是值得主张“直译”者一听的。安诺德认为，译者自以为忠实于原文，便真的能把原文内容译出，实在是一种谬见。他指出：“自然的某一种美，是存在于整体而非分散于各部的。所以诗人的优美总是蕴藏在风格与声调里，而非分散于单词上。谁都晓得柯珀的荷马译本已尽到直译的能事了；谁都晓得蒲伯的译本是放肆大胆的。……然而蒲伯译的《伊利亚特》，大体上说，还比柯珀译的更接近荷马。”为什么呢？因为荷马的原文，不论是在何种情节之中，读来都是简明轻快的，蒲伯的译文大致有此神韵，而柯珀的译文读来就比较滞重，词义虽在，风格尽失^①。在随意删削改易的意译流行之时倡说直译，未尝不是大进步，不过将外文的文法和句式结构等形式生硬译出，顺畅的读来不顺，那就谈不上忠于原文的语气口吻了。

钱锺书曾用袁枚论诗的“老手颓唐”四字形容林纾民国二年（1913）后的译作^②。对此林纾自己早已预料，他在《冰雪因缘·序》（1909）中承认：“恨余弩朽，文字颓唐，不尽先生所长，若海内锦绣才子，能匡我不逮，大加笔削，则尤祷祀求之。”（《书话》，第100页）民国二年，他又在《深谷美人·叙》表示歉意：“至于笔墨颓唐，尝念余老，嗤之鄙之，一听诸人。”（《书话》，第113页）这些谦辞确实道出了他的雅量。其实林纾在民国二年后的书信与各类创作，仍然精神抖擞，给人以“老来书渐稳”之感。即便译品略微下降，那也是他工作负担过重所致。

二 不分夷夏，新旧接续

1924年10月9日，林纾在京病逝。一个月后，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对他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他先说林纾守旧的不是，然后从三方面总结他对中国文坛的贡献。首先，林译小说填平了中西

^① 《安诺德文学评论选集》，殷葆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10页。

^② 《林纾的翻译》，第35页。